

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 丛书

程伟 主编



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

辽宁教育出版社 张凤林 等著

# 人力开发/探索与途径

## 主 编 的 话

1996年1月11日,辽宁大学经济学科的“三院一所”(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国际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与辽宁省委宣传部在辽宁大学联合举办了《“两个转变”理论研讨会》。与会的百余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提交了74篇学术论文或专题报告,并就一些重要的问题面对面地交流看法。1月18日,《辽宁日报》以“创新的实践呼唤创新的理论”为题,用整个理论版对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做了综合报道,在更大的范围引起重视和好评。

研讨会获得超出预想的成功,使我萌生新的想法:以我校经济学科的中青年教授、博士为主体,搞一套系统梳理辽宁经济问题进而探索振兴思路的丛书。一来,促进跨世纪师资队伍学术水平的提高;二来,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我将这一想法与经济研究所的李平、杨玉生、张凤林、林木西四位教授沟通,大家一拍即合,随即组建起课题组。至此,撰著

《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丛书，明知难度很大，但已经是横下一条心了。

辽宁作为全国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国有企业多，经济存量大，历史包袱重，现实矛盾突出，是计划经济的“重灾区”，无论改革还是发展，都面临异常严峻的困难，需要有比较熟悉辽宁问题的专家、学者提供专门的研究成果予以支持。我们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或更高的层面，来认识撰著本书的意义：辽宁是我国的一个大省，又是我国改革大业步入以制度创新为其基本特征的攻坚阶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实施场所，愈来愈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所以，振兴辽宁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区域性问题，而是与全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有着极强的关联度。甚至还应看到，振兴辽宁也愈加受到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因为老工业基地如何抑制衰退，再创繁荣，在国外，包括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样也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或许，正是因为丛书作辽宁文章，其意义却超出辽宁的局限，当我们1996年初申请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时，顺利地得到了批准。这使我们振奋，同时，压力也加大了。

为这套丛书确定怎样的定位？这是我们首先集中讨论的问题，并最终达成了共识：

——我们是理论工作者，不谈理论我们就没有优势，但又不宜把这套丛书写得理论色彩过重，因为它应该拥有关心辽宁乃至整个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从事不同职业的、具有不同文化程度与知识结构的广大读者。

——我们是文斋学者，虽然也经常闯荡社会，为撰著这套丛书又集中了一段时间从事社会调研，但把它写成拿过来就能用的、具有鲜明对策性特点的著作，终究不是我们的长项，实事求是地说，也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撰著这套丛书是以理清辽宁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为重要线索（这是进而制定解决问题的政策与措施的先决条件），立足于启发性，同时兼顾理论性与对策性。试图借助于启发性，为理论性与对策性的有机结合架起一座桥梁。如果我们的劳动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些旨在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新的观察视角，新的分析工具，新的思维路径……那么，我们也就达到了有限的预期目标的彼岸。

这套丛书是地地道道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课题组总计二十六名成员：有李平、杨玉生、张凤林、赫国胜、穆怀中、高闻以及我本人七名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有徐平、黄继忠、崔日明三名教授（在读博士生）；有高静娟（在读博士生）、杨志安（博士）、王厚双（在读博士生）、王韶玲、赵瑾（在读博士生）、刘俊奇（在读博士生）、陈德君七名副教授；有讲师八人，其中在读博士生二人，硕士六人；有助教、在读博士生一人。大家分为八个“支队”，用了大半年的时间边搜集资料，搞社会调研，边分别提出写作大纲草案。在此基础上，先后召开了六次课题组骨干成员研讨会，对八本书的写作框架以及主要内容和观点一个一个“过筛子”，群策群力，不断完善。1996年底，由李平教授协助我，对每本书的具体纲目做出最后

的协调与斟酌。

1997年，香港回归、十五大召开和江主席访美三件大事令世人瞩目，使之成为值得全国人民永远记住的一年。这一年，也是我们课题组成员苦煞心血、埋头写作的一年。当举国共享胜利的喜悦辞旧迎新之际，八本书疲惫的作者们刚好也如释重负，陆续完成初稿。我逐一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大家稍作歇息，又重新进入紧张的工作状态，向终点冲刺。——1998年5月，《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丛书定稿。

我们努力了，拼搏了。党和人民培养了我们，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能够做的一点事情。丛书的问世，使我们感到宽慰。丛书涉猎的范围广，领域宽，难题多，而我们的学识、水平和能力是有限的；况且，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远未完结，也永远不可能完结。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这项工作只是初步的尝试，难免会有不妥之处。祈希读者批评、指正。

十分感谢辽宁教育出版社给予丛书编写、出版的财力支持。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乔平同志，作为丛书的策划，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从丛书立意的论证，到写作大纲的研讨，再到八本书初稿的审阅与修订，他全程参与，做出了课题组成员公认的重要贡献。

十分感谢辽宁省、沈阳市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同志（详见每本书的“后记”）。他们不仅为课题组成员从事实地调研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和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还为丛书的撰著献计献策。

十分感谢我们的三位顾问，冯玉忠、高东晓、常卫国

同志。我每每向他们汇报丛书的总体构思、框架设计以及具体内容，他们每每提出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在丛书定稿的过程中，他们更是一丝不苟，仔细审阅，认真把关。

十分感谢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同志。他对我们的这项研究工作给予了重要的关注，并欣然接受我的请求，为丛书题写了书名。这是闻书记对我们中青年学者的巨大支持、鼓励和鞭策。

我们将这套丛书献给：

-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
- 辽宁大学四十年华诞

程伟

1998年5月28日

# 目 录

<b>1 关于人力资本开发与利用的理论探讨</b> .....	(1)
1.1 引论：竞争、人才与人力开发 .....	(1)
1.2 人力资本投资的特点及其形式 .....	(9)
1.3 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与供给分析.....	(21)
1.4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测量.....	(35)
<b>2 关于辽宁人力资本发展的实证分析</b> .....	(45)
2.1 关于中国人力资本发展现状与矛盾的一般 分析.....	(46)
2.2 辽宁人力资本发展的现状.....	(55)
2.3 辽宁人力资本发展的矛盾分析.....	(70)
2.4 辽宁人力资本开发与利用的基本对策.....	(87)
<b>3 优化教育规模与结构，提高人力资本开发效率</b> .....	(100)
3.1 教育是人力资本开发的重要途径 .....	(100)
3.2 教育投资的优化组合与资源的合理配置 .....	(124)
3.3 传统体制下辽宁教育发展的特点 .....	(148)
3.4 改革开放后教育体制的转轨与矛盾 .....	(166)
3.5 辽宁教育未来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思路 .....	(187)
<b>4 深化就业体制改革，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重组</b> .....	(201)
4.1 人力流动与人力资源有效配置 .....	(201)
4.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力资源配置 .....	(207)
4.3 我国劳动供求行为的特点与矛盾分析 .....	(230)

4.4 辽宁人力资源利用状况实证分析 .....	(245)
4.5 深化就业体制改革，促进辽宁人力资源 优化重组 .....	(253)
<b>参考文献</b> .....	(259)
<b>后 记</b> .....	(265)

# 1 关于人力资本开发与利用的理论探讨

## 1.1 引论：竞争、人才与人力开发

### （1）严峻的现实

历史的车轮就要驶入 21 世纪。回顾过去的近一个世纪，整个世界曾经经历了两次大战的颠荡，冷战的摩擦，不稳定的经济增长与繁荣。临近世纪之交，终于，经济竞争取代了军备竞赛，经济增长与发展开始成为全球的主旋律。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每一个不甘心落伍或被竞争所淘汰的国家或地区自然都不能不认真地思索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

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已经明确。这就是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传统的以粗放型为主向以集约型为主转变。可以说，能否真正完成这两个根本转变，将会严重影响到中国未来社会经济运行的绩效，从而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在下一世纪的前途与命运。

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有效地推动与具体实施上述两个

根本转变？这其中固然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许多问题，然而有一个问题却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这就是人力开发。为什么？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经济学，现如今都强调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人力资源是社会生产要素中最能动的部分，是推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虽然物质资源也是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客观基础，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前进的重要动力，经济体制等制度因素也极大地影响着经济活动的效率与福利后果。但是，它们的功能最终都只能是通过人力的作用而体现出来。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快慢，发展水平的高低，从根本上说将依其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状况为转移。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人口素质高，资本含量大。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落后，根本原因则在于其人口素质低，资本含量差。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发展规划局（UNDP）在其于1990年提交的《人力发展报告》中，明确地将人力发展定义为发展的核心<sup>①</sup>。

冷静地反思一下中国近一个世纪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虽然我们的祖国已经从昔日的“东亚病夫”一跃崛起为“亚洲的巨人”，但严峻的现实仍使我们无法陶醉于“巨人”的称号。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相比，并不值得任何骄傲；我们的发展程度，与现今发达国家相比，仍未超脱“相对贫困”和“欠发达”的范畴。这里仅举一例：1995年，中国人均GNP数值约500美元，在全世界排行倒数第33位，不仅远低于工业发达国家（约20 000美元），而且也相当地低于许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6 000~10 000美元）<sup>②</sup>。即使我们对上述美元指标运用

---

① 易纲等编：《台湾经验与大陆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页。

② 世界银行编：《世界发展报告（199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译本，1995年版，第162页。

汇率偏差指数(exchange rate deviation index)来加以矫正,中国的人均 GNP 数值也不过 2 500 美元左右,其差距仍十分显著<sup>①</sup>。面对如此之大的差距,每一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人都不能不思索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的落后?显然,就人力资源本身来说,答案只能从我们的人口素质方面去寻找。中国虽然号称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拥有 12 亿之众,但人口素质却相当低下。在 12 亿人口中,8 亿多农民,五分之一是文盲,残疾人 5 000 多万。思想观念闭塞落后,科技文化水平不高,严重限制了每个在业人员实际提供的生产力。观念的落后与不开化导致经济缺乏活力,体制变迁步履迟缓。科技文化水平的低下则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普遍低下。例如,80 年代以来,美国、日本、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我国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 10.29、10.9、7.27、8.77、8.78 倍。在汽车工业中,生产一辆小汽车,日本仅需要 20 小时,我国却需要 1 000 多小时。在钢铁工业中,日本、韩国工人平均年产钢都在数千吨以上,而我国最先进的宝钢人均年产量也只有 500 吨<sup>②</sup>。与此相联系,各种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也相当低下。经测算,我国 12 种主要原材料的消耗强度分别比美、日、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高出 5~10 倍以上,比印度也高出 2~3 倍。我国的单位产值能源消耗远高于发达国家,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 3 倍,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高出 1 倍<sup>③</sup>。不仅如此,人口素质的低下还使得相当一部分劳动力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处于失业状态,近年来我国社会已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闲置、失业队伍(至少约 2 亿人),他们的劳动生产

① [美]P. Samuelson and W. Nordhaus, Economics, 1995 年版,第 671 页。

② 宋养琰:《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性思索》,《经济学动态》1996 年第 10 期。

③ 高尚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学动态》1996 年第 10 期。

率等于零。凡此种种表明，中国并没有形成充分有效的人力资源供给，人口数量多、质量差已成为掣肘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严重问题。这才是我们与发达国家之真正差距。

## (2) 历史的经验

古今中外的许多事实，雄辩地证明人力资源或人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力量。我国古代早就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说。《吕氏春秋》亦云，得贤人，国无不安；失贤人，国无不危。大凡历史上卓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无不深谙“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的道理。我国“三国”时期刘备为求贤而三顾茅庐的故事至今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安邦定国是如此，发展经济也不例外。19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圣西门在一则寓言中曾这样写道：假如法国突然失去自己的50名优秀的物理学家，50名优秀的化学家，50名优秀的作家与诗人，50名优秀的军事家与工程师，那么法国很快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sup>①</sup>。圣西门在这里所强调的，正是掌握科学知识与先进技术的高质量人才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作用。本世纪60年代，揭开战后英国高教大发展序幕的著名的《罗宾斯报告》，也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指出了高知识与高技能的人力资本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该报告指出：假如一连串的核爆炸只炸毁了世界上的物质财富而保留下了受过教育的公民的话，那么世界无需多久就可以恢复到原先的水平；但是，如若所消失的是受过教育的公民的话，那么即使建筑物与机器完好无损，整个世界要恢复到原先的水平也可能需要比欧洲中世纪更长的时间<sup>②</sup>。

美国长期以来所以能够稳坐西方发达世界的第一把交椅，

---

① 熊映球等编：《不战而胜与人才争夺》，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② 谢瑾：《西方一些国家高教投入的市场导向》，《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6年第2期。

靠的就是其雄厚的科技力量和人才优势。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向来有广泛吸纳各方面人才的优良传统。人们不会忘记，当 30 年代希特勒大肆迫害犹太知识分子的时候，美国从欧洲各地吸收了数千名世界优秀的科学家，这对于其战后的科技创新与经济繁荣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据统计，从本世纪 30 年代到 70 年代，美国先后从世界各地吸引了近 30 万的高科技人才。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美籍外国人占有相当多數<sup>①</sup>。德国与日本在工业物质资本与社会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打击与破坏的情况下，战后能够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并跃居西方世界第二号强国的地位，其中的奥妙也只能从其国民素质及其非同寻常的意志力与创造力来解释。据悉，始终不渝地培养“生存危机感”与拼搏奋斗精神是战后德、日两国政府教育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新加坡的技术立国战略，韩国与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由政府主导实施的教育发展计划，也向我们展示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对此，当代人力资本理论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G·贝克尔（Becker）在一篇题为《教育——人才——经济》的文章中曾给予精辟的总结，他指出：近十几年来，日本、台湾和亚洲其他国家与地区令人注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生动地再现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些国家和地区，自然资源匮乏，几乎所有的能源都需要进口，但他们凭借一支训练有素、受过良好教育、工作勤勤恳恳的劳动大军，却使经济实现了迅猛发展<sup>②</sup>。

人力资源之所以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基本的道理就在于高素质的人口所蕴藏的知识技术含量能够转化为

---

<sup>①</sup> 徐人仲等编：《面对世界的人才之争》，新华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0 页。

<sup>②</sup> 范景州：《教育投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35 页。

巨大的生产力。不仅如此，从动态的角度去观察，人力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这种至关重要作用还将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增强。简要地追溯近现代经济史可以发现，西方世界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工业化初期的主要依靠资源投入的要素推动发展阶段，工业化深入时期的主要依靠资本积累的投资推动发展阶段，以及当工业化完成并进入后工业社会时期主要依靠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创新推动发展阶段。很明显，经济发展的阶段越高，对人力资源的素质与水平的要求便越高，从而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作用程度也就越大。如果说劳动力在工业化以前，主要表现为体力经验型，而在工业化初期主要表现为简单技术型，那么在工业化深入发展乃至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日益趋向于高科技型。当前，发达国家已进入创新推动发展阶段，整个世界已进入信息或知识经济时代，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未来世纪的经济发展必然更直接地仰赖于人力资源的发展与完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T·舒尔茨（Schultz）曾指出，人类的未来不是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的，而是将由人类的知识发展来决定<sup>①</sup>。著名的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也断言，在信息时代，战略性的资源已不再是资本，而是信息<sup>②</sup>。实际上，如果说得更确切些，这时的战略性资源应当是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与信息技术的人。诚如托夫勒所预测的那样，信息时代的“新型工人”应当是高智能的“脑力工人”<sup>③</sup>。这表明，未来世纪的经济竞争将主要表现为人才的竞争。一个国家能否充分有效地开发、科学合理地利用其人力资源，将直接关系到其

<sup>①</sup> [美]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中译本，1990年版，第42页。

<sup>②</sup> [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84年版，第14页。

<sup>③</sup> [美]阿·托扶勒：《预测与前提》，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中译本，1984年版，第36页。

竞争的成败与国势的盛衰。

### (3) 人力开发——别无选择的战略

从上所述可见，为了赢得未来世纪新的国际竞争与挑战，真正实现彻底摆脱落后状态、赶超先进国家的奋斗目标，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本开发的至关重要性，坚持以人为本。就经济体制转变而言，其根本目的实际上也就是要创造一种激发人的活力与创造力的机制，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人力开发。而另一方面，体制转变的实际进程又要受到现有人力资源状况（诸如思想、观念等等）的制约。就增长方式转变而言，它也是既为人力开发创造物质基础，同时又要受到人力资本开发状况的制约。可见，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与从事人力开发是紧密不可分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因此，为了有效地推动两个转变的进程，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振兴，我们应当毫不迟疑地努力把人力资本的开发提到战略高度，这是跨世纪的挑战，也是历史的呼唤。

上述发展思路同样适用于辽宁。辽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过去一直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近年来，辽宁经济特别是其国有经济的发展日渐缓慢，甚至出现了某种衰退的征兆。产生这种局面的原因既有体制改革滞后的制约，也有技术设备老化的拖累，此外，人力资源素质不高及利用效率低下显然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还是带有根本性的影响因素。应当说，人力资源既是决定一般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决定老工业基地发展与重新振兴的重要因素。老工业基地的衰落从形式上表现为产业结构的陈旧，技术水平的落后，实质上则反映了其人力素质的低下与创新能力的减弱。因此，固然如何使辽宁经济摆脱困境、走出低谷、重新振兴已成为世纪之交辽宁区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紧迫任务，但十分明显，这一重大任务最终能否完成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有效开发与合理利用

自己的人力资源。

进一步地说，如果从终极意义上讲，有效地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素质，实际上不仅仅是当前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与振兴的需要，而且也是促进我们“人”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人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应当说，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目的则是在于逐步创造日益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条件，以便实现社会的主体——人的充分自由发展和完善，充分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并充分满足人的自身幸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未来高度民主、文明与发达、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需要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前提，同时也将以它为最终目标<sup>①</sup>。这显示了人力资本开发的恒久历史意义。

广义的人力资本开发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对现有人力实施合理地开发，即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与科学文化事业、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实行计划生育与优生优育政策等等，不断地提高现有人口与劳动力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从而使现有人力资源供给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与优化，增强其资本含量，以期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二是对现有人力加以有效地利用，即通过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充分调动全体国民与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刺激其努力程度的提高，从而将现有人力资源所蕴含的经济潜能高效率地发挥出来。

为了实现上述人力资源开发的任务，我们显然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从本质上说，乃是人力资本开发的重大工程之一，其基本的功能在于实现激励相容，从而为人们的经济活动进而整个经济运行注入活力。众所周知，传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75年版，第273页。

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僵化的制度，它不仅限制了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而且也压抑了人的创造性的发挥，障碍着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只有尽快实现体制转轨，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才能真正理顺人力投资的成本—收益关系，从而为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创造适宜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当然，强调市场机制对于人力开发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忽视政府的职能。政府在社会的人力发展方面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通过制定科学的人力开发计划，采取适宜的公共政策措施，可以促进和引导人力资源的健康发展，形成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应当看到，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既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它的实现需要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和协调发展，依赖于几代人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清清醒醒地看问题，认认真真地做决策，扎实实地干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民族在未来的世纪真正赢得国际竞争，实现繁荣昌盛的美好理想。

## 1.2 人力资本投资的特点及其形式

### (1) 为什么应当将人力视为资本

谁都知道，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能动、最科学、最活跃的因素。任何生产活动都要靠人来发动和进行，通过人力作用于外部自然界而实现某种物质变换，产生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物品。最初，人力对于自然界的作用是采取原始、直接的形式。后来，由于学会了制造与使用工具，人们又通过操纵生产工具来间接地作用于自然界。但不论采取哪一种形式，有一点十分明确，即人始终是生产与经济活动的能动因素或主导力量。正